

日本侵略者首次进犯清丰

姬建标 牛章勤

1937年“七·七”事变后，由于驻守华北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，致使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。未及三个月，北平、天津、保定、石家庄等城市便陷于夷敌的铁蹄之下。11月中旬日军攻占冀南重镇大名，当时驻守冀南一带的中国军队主要是国民党的二十九军，即宋哲元部，他们稍试抵抗，便仓惶南逃。12月上旬，日军驻邯郸一带的108师团，在驻大名的14师团管余恩支队协助下，对宋哲元军穷追不舍，12月15日（农历十一月十三日），日军攻占清丰、南乐，宋哲元未作大的抵抗，便渡过黄河逃之夭夭了。

日本侵略军于12月14日从观城方向进入清丰县境，当天傍晚，抵清丰城郊，稍试攻打，便停火驻扎在城东五里屯、东大屯、坑李家、姚庄一带。15日天亮后，枪炮声大作，顿时清丰城笼罩在硝烟火光之中，当时留守清丰的国民党武装力量为河北省保安队的一个营，兵力约400人，在一位姓鲍的营长带领下，抵抗三四个小时后，终因寡不敌众而向西败退。保安队伤亡惨重，生逃者仅百来人。日军亦有伤亡，据目击者讲，撤离时拉走五六马车死尸，估计百人以上。这是日军南下以来，在冀南遭受的一次最严厉打击。

日军攻陷清丰县城后，奸淫掳掠，无恶不做，尤其残忍

的是，以“惩办敌对分子”为借口，像红了眼的野兽一样，见人就捕，捕住就杀，男女老幼，一个也不放过，仅15日、16日两天时间，就有1000余名无辜群众惨遭杀害。这就是清丰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一次大惨案，即（一一·一三）惨案。

12月15日，县城北街的85名被抓捕群众，除1名死里逃生外，其余84名全部被杀害，一条仅有十多户居民的张拐街就死难28人，其中张远征、付鸿德、高改成、姜五妮、张画匠等7户被杀绝。卖“洋油”的王某，被两名日军拧架住胳膊，一名日军像发了疯一样，在背后边走边用刺刀捅，王某鲜血淋漓，一路惨叫，霎时间倒于血泊之中，其余群众被赶到一个坑边空旷地上，用井绳围捆在一起，全部被日军用机枪扫杀。同日，日寇在县城东街、南街、西街相继屠杀无辜群众数百人，南后街57名被抓捕群众，赶到南城墙下的一个角落里，以“敌视友邦”为罪名，砍头的砍头，剖腹的剖腹，连当时“福利院”的十多名残疾人也未能幸免。有5名青年妇女，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受污辱后，又被开肠破肚，其惨状至今谈之令人发指！

12月16日，日本侵略军在县城四关及附近村庄继续捕杀群众。城西一个十多户人家的赵庄村，死难25人，其中杀绝5户。居民赵玉中被砍了头，其老婆被投进沸水锅内活活煮死。这天下午，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，在城南王窑村一坑砍杀20余人，在秀才营、姚庄、车子营、阎石庄、黄庄、张庄、坑李家等村也杀害许多无辜群众，真所谓“争地一战，杀人盈野；争城一战，杀人盈城！”

日寇的这次进犯，是一次试探性军事行动，未敢长驻久留，于12月17日早晨匆匆撤回大名。进犯时间虽然只有两三

天，但侵略者野蛮凶残的豺狼本性却暴露无遗。

遭劫后的清丰县城及附近村庄，大街小巷血污遍地，到处是被害群众的尸体。死难者有的陈尸家门，有的暴尸街头，有的身首异处，尸骨不全，有的血肉模糊，面目全非。由于逃难的群众心有余悸，迟迟不敢返回，死难者的尸体多日无人收殓、掩埋，其惨状睹之令人不寒而栗！后经中共清丰县委和四支队（隶属中共直南特委）作了稳定情绪的工作后，逃难的群众方陆续返回家园，在一片揪心的嚎哭声中收葬了死难的同胞，县城四郊的田野里，霎时增添了一片片新坟！

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为，激起了清丰人民的极大愤慨，为了给死难同胞报仇，广大青壮年纷纷要求参加抗日武装，有的自发组织游击组、自卫队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清丰人民曾把农历十一月十三日作为同胞蒙难纪念日，连续多年届时集会纪念，以示不忘国仇家恨。尔今虽然时过半个多世纪，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所欠清丰人民的这笔血债，却依然记忆犹新。

唐庄破击战

高 嵩

1941年，日本侵略军对我华北抗日根据地加紧了疯狂的扫荡，大搞“强化治安”，实行“三光政策”，沿公路两侧修筑碉堡、架设电线、挖封锁沟，妄图分割“蚕食”我抗日根据地，给抗日战争带来极大的困难。是年4、5月间，为粉碎日军的扫荡和“蚕食”、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、振奋抗战情绪、中共清丰县委配合南进支队（亦称赵谭支队，即赵承金、谭冠三）在清南公路沿线，组织发起了颇具规模的著名的破击战。因主力部队和主战场发生在清丰城北唐庄，故历史上称为唐庄破击战。

一天夜晚，月黑风高，万籁俱寂。南进支队21团2营和清丰县委及其领导的一、二、三、四区党政军民组成1500名的破击大军，悄悄开到了清丰城北清南公路两侧。具体部署为：地方武装和主力部队一部，负责对公路沿线的敌人炮楼实施包围。而主力部队大部部署在城北唐庄一带，准备伏击县城增援之敌，以保障破路大军的安全。清丰县委及一、二、三、四区党政军民持破击工具，在清南公路沿线待命。

午夜之后，破击战斗开始，千余名破击大军一齐上阵，挥动粪叉、铁锨、镢头、锯子、斧头等破击工具，破路的破路、平沟的平沟，有锯电线杆的，有割电线的，20余华里长

的清南公路上，一片紧张繁忙的景象。军民齐心协力，干劲冲天，汗流浹背不顾擦，划破皮肤血流如注不包扎。经过紧张战斗，封锁沟、公路变为平地，电线杆、电话线化为乌有。与此同时，敌工组的同志，在掩体内分别对各据点的伪军展开了政治攻势，向他们喊话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、教育伪军不要当汉奸卖国贼；要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；作事要三思而后行，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；要给自己留条后路；日本侵略军是兔子尾巴，长不了啦等等。

深夜三点多钟，清丰县北门响起了一阵炮声，接着传来了敌人汽车缓慢行驶的嗡嗡声，指战员知道这是日军出动了。敌人的汽车队象蚯蚓一样慢慢爬行，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提心吊胆，生怕遭到我军伏击。后来，他们见公路沿线一片寂静，和往常一样没有什么特殊，象受了惊的兔子似的，放大胆子，加快车速窜开了。这时，埋伏在公路两侧玉米、谷子地里的战士们，荷枪实弹，紧握着打开盖的手榴弹，静等着日军进入伏击圈。不一会儿，敌人的汽车开过来了，一辆、两辆、三辆……突然，营部的重机枪开火了。这就是信号，“打！”一声令下，枪弹齐鸣，震耳欲聋，手榴弹，机枪子弹暴风雨般地涌向敌人，炸得日军人仰马翻，血肉横飞，哇哇乱叫，幸存的慌忙跳车，向西南抱头鼠窜，退回县城。伏击战打的干净、利索。日军留下数具尸体、三辆汽车、数支三八大盖枪和一个掷弹筒，只好向隅而泣。

这次破击战，使日、伪军在清南公路上苦心经营的封锁沟、公路、电话网一夜之间破坏殆尽，日伪军象惊弓之鸟退缩在炮楼内不敢露面，嚣张气焰受到沉重打击，从而鼓舞了清南公路沿线军民的抗战情绪，坚定了日军必败，抗战必胜

的信心和决心。瓦解教育了伪军，在清丰军民抗战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。

走出闺门干革命

付秀香

我是清朝末年生人。娘家是清丰东大街的，我读过几年书，家里种着几十亩地，是个耕读之家。婆子家也是清丰东大街的，姓马，丈夫去世早，只生下一个闺女。我来到马家，上有奶奶和后婆子，家规严，管束得紧，对俺母女也不大体贴和爱戴。我未参加工作前，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。

一九三七年冬，日本侵占了大名、南乐后，清丰的县长李荣谦弃城而逃，上层人物也携妻带室、细软逃过了黄河，县城里的一般居民也搬到了乡下。我家也搬到了城西孟村。这年十一月间，日本侵犯清丰，我们在孟村就看得见日本鬼子骑着洋马，佩着战刀，银光闪闪，耀武扬威的。日寇进城时，虽遭到了某部爱国官兵的抵抗，但是寡不敌众，清丰失守。日本鬼子进城后，见人就杀，尸体成堆，血染全城，有上千无辜的同胞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之下。少数妇女逃进教堂幸存（教堂是不让男的去避难的），北街张拐死难的最多。不久，日寇就撤走了，土匪、歹徒乘虚而入，抢劫财物，大发国难财。春节将近，我回到家里，看到一只狗吃得很肥，没有主人豢养，是靠吃尸体肥起来的。人们回到家里，无心过年，都是人心惶惶，稍有风吹草动以为日本进城就逃命。

我的两个弟弟参加了抗日工作，我也不敢在家停留，就到了

城北唐营三妹妹的婆子家里去住。她公公弟兄五个，是行三，妹妹有很多侄子，有的比她的年龄还长。妹妹为人好，叔伯妯娌之间很和睦，侄子们也都很尊敬她。有一天，一位女同志来唐营找我，是二弟学阶介绍来的。她叫杨君，天津人，穿着军装，是在四支队搞民运工作的。杨君同志是找我落脚，宣传发动群众抗日的。我当然很支持。于是她就女扮男装，称呼她是我娘家弟弟。我们经过商议，物色了三妹妹的最大的侄子王善延同志，这个人在村里有些威望，能抗住事。和王善延谈过后，他表示愿意掩护杨君，支持开展抗日工作，我用串门子拉家常的方式，宣传发动妇女。王善延是本村的，开展工作更方便。过了几天，王善延建议集合起来开个会，我和杨君也都同意。我们议定以烧香磕头为名，到庙里开会。这天与会的妇女二十多个。杨君在会上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，讲了团结起来，抗日救国的道理，还讲了妇女受苦最深，处在社会的最底层，她们洗耳恭听，有的还掉下了眼泪，一致表示愿意抗日，情绪很高涨。当杨君说选举干部、登记名字时，她们都走了，有些怕了。但我不灰心，坚决参加救国会，要杨君写上我付秀香的名子。

后来，我就找那些丈夫、儿子或其他亲人被日寇杀害了的妇女，发动宣传抗日。这些人对日寇有深仇大恨，一说抗日报仇都很坚决，说干就干。特别是城里北街张拐那些寡妇们劲头更大。她们的亲人被杀了，东西抢走了，无牵无挂，无顾忌。为丈夫、为儿子报仇抗日，就是死了也不怕。我带领她们到国民党县党部要求抗日。大唱抗战歌曲，高呼“打倒汉奸”的口号，县党部并不大支持我们，说是一群疯老婆

子。后来，我找到了晁哲甫同志和高镇吾老先生。我说，我们这些妇女对革命很忠诚，抗日很坚决，为亲人报仇，教育孩子为祖国报仇，第一不怕死，第二不怕苦，第三不怕造谣骂“破鞋”，我们慰劳伤病员，做军鞋，什么都能干。晁老他们很支持我们，于是我和杨君在女高办了一期训练班，参加的都是妇女，共七天，经过学习大家的觉悟提高了，抗日情绪更加高涨了。

一九三八年夏，我们到了东南区六塔一带，住在晁涌光的家里，白天到周围村子里去宣传，夜晚回晁家住。到了村里，先唱抗日歌曲，人多了就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，深受各阶层人士的欢迎。不论穷的富的、商人农民都拥护，并热情招待。到了天冷时，才回到县里，但是并没有成立什么抗战组织。这时，县里已建立了动委会。回县后我被派到一区动委会去。当时全县分五个区，县里领导人 有袁士先、刘镜西、刘清霜、丁素玲，还有姚伟杰。一区动委会里有卢凤仙，还有的是国民党员，我不愿和那些国民党员打交道。

我回到马家，西屋里住着县长的秘书，姓王，三十多岁，吃得胖胖的，老婆四十来岁，还有两个闺女。我住在两间正房里，门旁砌了个天爷台。有一天，我向他讲“抗日高于一切”，并让他的小闺女念抗战宣传品。时隔不久，他喝了点酒，坐在天爷台旁，不醉假醉地骂街：“他妈的，我总知道她是什么人！”他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是指桑骂槐地攻击、威胁我，我大吃一惊。我在惊诧之中，断定姓王的是反对抗日的，是个汉奸。他这样一骂，后婆子对我更不好了，奶奶对我也有反感。有事时，问她们几声都不哼。

农历十月初一，女儿耀光要我和她一同上坟给他父亲烧

纸。在道上耀光说：“我要参加抗日，走后您还给父亲烧纸不？烧纸也别哭啊！”又说：“我走了，您也别想念俺哪！”我熬寡只有这独生闺女，真难舍难分，但孩子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远离家门的，我支持她。我极力抑制住自己，不表现于形色。我怕她走后，象我想念她那样挂念我。当我们母女俩回到家里，姚伟杰的女儿和另一女同学都等着她。当天下午就去梁村了，当时梁村是直南特委所在地，领导抗日救国的中心，为冀南爱国志士和广大人民所向往的地方，荣获“小延安”之称。耀光出门时，她祖母和曾祖母不理，又不送。她们走到北大街耀光遇见外祖父，说是到梁村去。晚上，我父亲就和母亲闹气：“两个儿子远走高飞，外甥女又走了，他们都成杀爹党了。等着抄家吧，下场好不了！”

过了几天，我冒着大雪到梁村去看望耀光。她正在训练班里学习，耀光怕我疼爱她，舍不得离开，与我不敢接近，我也怕她疼爱我，动摇了她抗日的决心，我对耀光也不太亲热，我们母女俩很少坐在一起说话，表面看来母女之间淡淡如水，别人都说我是后娘，耀光不是我的亲生闺女。一天夜里，耀光来向我辞行，她参加了黄河支队，在宣传队里工作。换上了军装，把我给她做的衣服打了包袱交给了我，没说几句话，就匆匆地走了。

我从梁村到城西赵楼我外祖母家里，晚上妗子们都说我不该让闺女参军走。第二天赵楼村的救国会开大会，让我到会上讲讲抗日救国。讲后我见到两个街坊，他们喜出望外，回来吧，咱东街妇救会可有人领导啦。他俩都是东街救国会的领导人，把我的包袱用自行车载走了。在外村领导抗日救

国可以，在东街可不好办。马家有两层老人，娘家父亲脾气不好，感到拘束、受拿落。当我去梁村后，后婆子就给我娘闹气：“媳妇，孙女都走了，把屋里东西也拿得光光的。”我回到娘家，母亲数落我，惹得后老婆和她生气。两个街坊把包袱捎到了马家，并且和婆子做了思想工作，让她们支持我。我到马家去拿包袱，后婆子和奶奶还是不答理我，感到无聊，在屋里转了几圈，我感到进了马家，就象笼中鸟一样。真是“一日在家一日愁，不出闺门何时休，本想出家干革命，二老怎肯放金钩。”我忧心忡忡，走出马家大门，坐在场里石礅上：“咋办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最后下定决心，走出闺门干革命。

我毅然离开马家，投入抗日的行列，再不回来。我找到县里领导人姚伟杰、刘清霜等。姚伟杰是我二弟的同学，他是姚庄的，与我娘家又是地邻，以前就认识，见了面就叫大姐姐。当时，我不知道他是县委书记，他对我很支持，后来在工作中对我帮助也不小，并由他介绍入了党。他说大姐姐有什么困难就说吧。我说：“我们班人多是寡妇娘们，男子有势妻有时，爹娘中用孩儿娇，有人看不起我们，骂我们是疯子。不支持我们抗日，有时饭也吃不上。”他说，我支持大姐姐，并讲了些革命道理和如何工作，我听了心里亮堂多了，有了领路人，我也不断向他汇报工作。当时国共合作，共产党办抗日训练班国民党也办，有的妇女参加了国民党办的。当大家碰在一起谈两种训练班情况时，有的说共产党好，将来让孩子参加共产党。也有个别的说国民党好，有枪有炮，有官有帽的。我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姚伟杰同志，他更加重视妇女工作了。他让我到西北梁村一带去参观，学习

领导妇女开展抗日工作的经验与方法。梁村的救国会成立得比县城里的还早，妇女领导人刘翠芹和马玉玲，都是青年学生。马玉玲是老党员马彩三的女儿，他大力支持和帮助女儿的抗日工作。这里还成立了儿童团、姐妹团，抗战工作搞得轰轰烈烈。我也见到了马彩三同志，他教育我在抗战工作中要搞好革命团结，不要脱离群众，从吃饭穿衣到说话待人都要注意，一定要和群众打成一片，他的一席话使我收益不少。我又到了其他四个区。这次参观学习，使我深受教育和启发，对我后来工作有很大帮助。

在“抗日高于一切的”号召下，三八年县里建立了些抗日组织和团体。国民党也喊抗日，成立救国会，办训练班，和我们争夺人。我集合了二十多个积极分子，借用青救会于店上办班用的锅灶住房，我们妇救会也开办训练班，共七天。我和杨景先、程松姣、李瑞环、韩秀云、陈佑菊六人为骨干负责组织领导。刚开班，就有股子谣言，说我们六人中有“破鞋”，在店上村北石碑旁生下孩子。我把这件事汇报给领导，上级指示对此事不能回避，越掩掩藏藏，对我们开展妇女工作越不利。要揭开，追根源，使之水落石出，真相大白，挽回影响。经过调查，原来是店上一个妇女说的，我们六个都站出来，让她拉出“破鞋”是谁。她指指刘贵森说：“就这个穿灰色袄的。”吓得她说话声音又低，又颤抖。刘贵森大大落落，说：“我是明媒正娶，生了孩子能不要扔掉吗？”参加训练班的只有刘贵森同志带着一个女孩，但也不是刚生的。一阵风波平息后，训练班继续办下去。结束后，大家积极开展抗日工作。

党号召减租减息，二五增佃。我不大会算帐，领导了长

工增佃，杜丰乐负责减租减息。我包了城关区。我首先发动娘家和婆家的长工先带个头。我娘家的长工叫老东，是爷爷的学生，跟父亲学熬硝的手艺。马家的长工是车子营的，我叫他四老爷，他是奶奶的四兄弟。奶奶、后婆子和我都是三辈寡妇，家里没有干活的人，这位四老爷来马家当长工，除担水、看管小孩外，还要每天磨面。马家是给人家当门户，喂了头小毛驴，磨一斗麦子，卖26斤面，赚下麸子和下面，家里花销和耀光念书全靠他磨面的收入。我让老东邀来了十来个长工到马家东屋里开会，四老爷当然也要参加。当我未进屋时，他们抽着旱烟，拉话很热火。我进屋后，他们都不言语了，很受拘束，神情不安。当时我还年轻，又是个寡妇，人们的封建思想都很严重，“男女授受不亲”。当我讲了二五增佃后，他们却不是热烈的响应，而是面面相觑，谁也不说话。后来还是马家的长工四老爷说话了：“我不是图钱，为了姐姐年岁大，家里无人(指能干活)，我不要增佃。”我解释道：“四老爷，您家能过得去，还有别人哪，你们都是靠工钱养家的，自己吃上饭，家里还有老小，年终下工落不了几个钱，怎能养家糊口呢？”他们点头称赞，但是顾虑重重。我越讲道理亲近他们，他们越不安，后来就走了。事后，老东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父亲，我父亲就责问干涉。有些长工见了我躲着走，怕我和他说话。虽然二五增佃没有搞起来，但也有影响，它给后来普遍开展这一工作，起了一定积极作用。

记得一九三九年濮阳专员丁树本参加洛阳会议后，与我们的磨擦一天天增多，投靠了国民党，反对抗日，但尚未公开化。我们继续争取他，与我们合作。记得丁树本来到清丰，大街上贴了标语，“拥护丁司令的抗战三大主张！”丁

在文庙里开会，我们妇救会也参加了。县里领导人中还有杨节。丁讲到：抗日可以，救国会里有人捣乱，谁是头儿，我把刀磨好，要切他几个（指共产党人的头）。我们一听丁讲的抗日是假，反共是真，就起哄。丁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大嫂，不要吵了，每人给四十块钱，不要吵闹啦！妇女们大声反驳：我们不是为了要钱，为了抗日报仇！人声鼎沸，会场骚动，弄得丁讲不成话，开不成会了。“咳呀，我到过好多县，都没见过清丰这样的妇女……”于是就草率地结束了会议。

后来，救国会总会在濮阳召开会议，我代表清丰妇女参加了。总会负责人是安法乾，在濮阳西街办公。到了那里见到了清丰的陈笃之、许敬贤、范世钧等人。我被选为总会领导成员。这次会议上记得讲的主要是，要搞好团结，贯彻执行统一战线。只要抗日，即使国民党员的闺女，也要团结的。不要计较个人什么名利和地位高低。我文化水平低，感到在总会工作不能胜任，会后我又回清丰了。

一九三九年，有一天，县农会主任杜丰乐告诉我，县长毛汝彩让他和我一同去见他，但不知何事。我们俩感到突然，见县长言少凶多，可是又不能不去。杜丰乐是店上人，农民出身，平时说话，不紧不慢，脾气不急不躁，也很有胆量。我是孤独寡妇，什么也不怕，都准备着被捕坐牢。来到县政府大门前，站岗的卫兵持枪拦问：“干什么的，站住！”“县长请我们来的”。不等他们去传达就扬长而进。我们到了会客室，县长还不知道，毛汝彩急忙出来应酬：坐下、坐下，请喝茶。我们落落大方地坐下，但是内心里还是有些紧张。我们说：“毛县长，您有什么吩咐？”“哦、哦

……没事儿，请先喝茶。”显然，他对我们准时到来出乎意料。片刻之后，便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嘿，嘿，嘿，……没什么事儿，不过——”倏然，脸色阴沉下来：“救国会会有个×××，你们知道吧。”“知道他，县长。”“他是共产党，传播马列主义的”，说着向我们投来恶毒的目光，“你们知道，那么——”我立即回答：“不，我们知道他在救国会里，是不是共产党，我们咋能知道呢？”他沉思着“嗯”了一声，然后，盛气凌人，语调狠毒地说：“对共产党是不客气的！妈的”，说罢探视了一下我们的神情。接着道：“注意，以后注意。”杜丰乐回答“对，注意，一定注意”。我心里说：“我们早就注意你这个不抗日的县长啦。”毛汝彩又突然问：“你们的领导是谁？”语气急促，其阴险用心是让我们脱口说出党的领导人，如果回答迟疑，吞吞吐吐，就暴露了我们俩是共产党了。“是谁？”杜丰乐哈哈大笑，“是县长，您就是我们的领导，不然，您为什么叫我们来。再者你叫我们也不来。”杜丰乐又以攻为守地说：“想不到县长今天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必定我们有违县长之命不抗日之罪，请训教吧！”“说到那里去啦，哈哈……。”毛汝彩苦笑着说。他的“打”、“诈”两招失败后，又来“拉”我们。“我毛某为一县之长，爱民为本，我不得不提醒您。”“感谢县长的关照”，“不客气。”毛语气较前缓和多了，并且还假惺惺地硬要掺进几分关怀的意味：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今后要多联系。”我们又表示对他的感谢。我还向他提出每月一块钱太少了，有时还没有饭吃。杜丰乐接着说：“钱少，没有吃的也没有什么，都是本县人，从家拿么，您是一县之长，您叫干啥就干啥，今后还会有不少麻烦您”。

“不客气，我尽力而为之。回去吧，今后注意！”我们走出了县政府大门，心中那块石头才落了地。“今后注意”。我们早就注意你啦，今天你叫我们来就没有掉以轻心啊。后来，我又找过县政府，说脚小走不动路，结果给买了辆自行车。国民党县政府的确对我们注意了，派人到我住室来，表面是闲谈，实际上是侦探。把我看的《论持久战》和些革命歌曲偷偷地拿走了。但这些材料在当时并不能断定我是共产党员。从此以后，我尽量少和他们接触，不打交道。他们通知开会，我就找些青年学生去，问不出什么情况。过一段时间，再换几个人。把骨干分子派到各区去，我也很少在县城里住。一九四〇年初，过旧历年时，我和高翠莲住在刘月芹家里（城内衙前街）。一天夜里张仪庄的程万森见到了我，吃惊地说：“十军团就要来了，快出城逃命吧。这回可不是混着玩的。”程是马家的门婿，我该叫他姑夫的。原来准备明天召集各区救国会来县开会。根据情况是开不成了。我就打电话通知各区，天明我到了赵店找到刘翠环。我把十军团来犯清丰的情报告诉她们，忙着收拾文件、图章什物，包成一兜交给一位老太太收藏起来。马村区的刘子才也赶来了，他要洗脚解乏，我劝阻他，让他快吃刚蒸熟的馒头，我们马上撤走。我又把需要带的衣物装在自行车上。我揭锅抓出两个馒头正要吃，十军团进街了，一个当官的骑的白马，汗水如洗，来到院里。我一边递馒头一边说：“老总，请吃吧。”不等他回话，我装着解手进了厕所，越过墙头，翻过寨墙逃走了。在途中刘翠环也推着自行车赶上了，二人喜出望外。我们绕道来到县城。傍晚时候回到娘家，大兄弟正在收拾扁担，一区的干部王栋也在我家，他俩说了声：“大姐姐我们先走了”

便匆匆而去。我当夜来到乔营亲戚家里，我奶奶也在这里，吃了饭，偃着奶奶躺下。天不亮她还瞌睡着，我又悄悄地不辞而别了。出了乔营往西北走了不远，遇见了杜丰乐，就一同到古城集见到袁士先等同志，向他汇报了情况。袁也传达了上级的指示：我们救国会不供给十军团给养、草料。城北没有驻军。我们开会并把这一指示传达到群众中去。十军团到处找救国会的人：“袁士先、付秀香到那里去啦，快拿出给养给我们！”就在这天的夜半时，古城街上人喊马叫，以为是十军团抓我们来了。原来是我们队伍追击十军团的。很快十军团撤出了清丰。赵店的那位老太太把我交给她的一兜子东西扔进了井里。十军团的士兵打水时发现了，于是就把她和房东老太太都绑起来，严刑拷打，进行审讯。藏东西的那位老太太受刑不过，供出了我。于是十军团的人来到县城东大街娘家抓我，家中没有一个人，便在大门上写上“红匪之家。”并要放火烧房子，周围的邻居怕自己家的房子也被烧着，便苦苦哀求。但是，那些祸国殃民的石逆判军却置若罔闻，不知那位邻居喊道：“日本飞机轰炸县城来啦！”围观的人一哄而散。他们也信以为真，抱头鼠窜了，侥幸我家这次未遭火灾。这年，农历二月，濮阳专员丁树本南逃投靠了国民党，清丰的县长也弃职南逃了，十军团也被赶出了清丰，于是，我们乘这个有利时机，建立了自己的新政权，选举袁士先同志为县长。民主新政权的建立，标志着我县抗战工作又前进了一步。

清丰民主政权建立不久，刘清霜到救国总会工作，我是县妇联主任。日伪大扫荡时，我到了县东。日寇扫荡很残酷，环境很恶劣。有一天，县长袁士先和刘镜西同志让我到